

當代中國基督教 面對的挑戰（下）

對談：黃保羅、邢福增

（黃：黃保羅；邢：邢福增）

四. 丁光訓及神學思想建設

邢：丁光訓原本在加拿大，參與國外的基督教學生運動。「三自」運動開始的時候他不在，1951年回來即當了廣學會會長。1952年剛成立金陵神學院的時候，又馬上就成了院長，他之前沒有神學教育的經驗，很年輕，1917年出生，三十多歲就成為了金陵神學院的院長，這應該是他得到政府幹部很大的信任。吳耀宗是1979年去逝的，之後1980年初王明道從監獄裡釋放出來，丁光訓等於接了吳耀宗的位置，1980年建立了中國基督教協會，丁光訓成了會長，中國教會領導人的位置。

黃：依您看來丁光訓在基督教的影響在哪方面呢？

邢：丁光訓在1980年代末的時候提出「三自會」已完成它的歷史任務了，但是這個說法引起了「三自會」裡「老三自」的反對。

黃：也就是說丁光訓的時代「三自」內部也是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邢：是的。

黃：丁光訓主要在做什麼樣的貢獻？

邢：他不僅是政協副主席，也是全國人大常委，1980年代用他這樣的政治地位也為教會提供很多的幫助。

黃：除此之外，丁光訓也做了很重要的神學思想建設，特別提出「淡化」「因信稱義」，您覺得他這樣在中國教會的影響如何？

邢：1980年代跟吳耀宗的處境有點相似，就是中國政府也需要家庭教會的團結，1996年丁光





訓必須要退休了，一方面他沒有了兩會主席的身份，說話就更自由了一些。另一方面，他在1980年代對屬靈派有太多的保護，所以，現在屬靈派已經越來越厲害了。而且，他在1998年提出了神學思想建設的說法，「淡化」「因信稱義」，讓人覺得他要碰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了，所以，在兩會裡面反對的聲音也很大。

黃：對的，因為「因信稱義」是新教的核心。我覺得他提出的問題本身是有價值的，但是，「淡化」的概念會讓很多基督徒害怕。芬蘭學派專門研究馬丁路德的「因信稱義」，因信稱義的「信」並不是一個動詞，不是人的行為，並不是人自己的主觀決定，而是耶穌基督送給人的一個禮物。因為這個作為禮物和恩典的「信」我們才能上天堂。

邢：我非常同意您的說法。「信」與「不信」在中國教會裡成為重要的課題。丁主教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所以，造成了教會內部的分化。

黃：丁主教特別強調要打破「信」與「不信」的界限，他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不是這兩個：一個是要談基督教與政治的關係，另一個是「淡化」，「因信稱義」。

邢：當時江澤民提出了宗教要跟社會主義相適應，丁光訓的神學思想建設希望通過政治影響力來建設教會，結果引起了內部的不滿。

黃：這點上來說丁光訓遇到的待遇與吳耀宗還是有點相似。

五. 現在火熱開展的基督教中國化

黃：您怎麼看基督教中國化的問題？

邢：看您怎麼理解了。尤其是習近平2015年的講話之後，基督教中國化已經成為了國家政策。根本的中國化，還是政治的中國化。

黃：這樣的話，最核心還是政治層面。「三自」教會的人有個說法：基督教是洋教所以才要建設「三自」教會。那為什麼現在還說要中國化，是不是這個洋教的帽子還沒有脫掉？

邢：現在是認為這個基督教還不夠中國化，所以還要繼續。這與中國夢等概念是相似的，也就是說中國要走自己的道路。習近平在中國論述中提出了要建構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宗教理論，然後把宗教中國化看成是其中的一部分。

黃：我們剛才先是講到民國初期的非基運動、後來是「三自革新」和「三自愛國運動」、後來又是神學思想建設和現在的中國化，我覺得這幾個串一下的話，其核心涉及的是兩個問題，一則是政教關係問題，二則是外來宗教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民族主義問題。關

於中國化問題，應該以「政治神學」、「文化神學」和「魂體神學」三條路徑來進行，另外找機會探討，在此就不專門談了。²

邢：對的。

黃：今年（2017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我們來思考政教關係的問題時，可以特別思考一下馬丁路德理論的借鑒意義，路德認為，上帝管理世界是通過兩種方式也就是兩隻手進行的：他右手是用溫柔的手段，但是，如果光用右手的話有很多不信的人是不行的；他還要用左手，就是政府，用暴力的手段。上帝用兩種手段來管理人類，路德所說的可以體現在耶穌的話之中：「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這句話在歐洲就這樣施行下來。您覺得這一點在中國的宗教裡是怎麼樣的？

邢：我覺得中國一直也有這樣的理念，也就是政教分離，但就可能沒有這麼強烈。歐美傳統的政教分離是政治與宗教互不干涉，但是中國特色的政教分離是宗教不能干涉政治，但不代表政治不干涉宗教，也就是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這個我想是整個中國民族社會的發展過程，也不只是針對宗教。

黃：我覺得這是比較客觀地描述了中國的狀況。回到剛才我們講的「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的政教議題。在路德的時代屬世的君王一般都不是基督徒，當路德說這個的時候他是批判當時的羅馬教會，他認為教會不關心屬靈的事情反倒去關心屬世的，所以他提出政教分離，讓世上的君王來管理屬世的事情。但是，現在的世界卻是「凱撒的歸凱

撒，上帝的歸上帝」。所以，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路德有很好的理念，可以參考。

邢：您是路德的專家，當然您的理解是對的。您是從路德的角度來看中國現在遇到的政教困境。



黃：是的。我想提一下大國學的理论，中國人認為儒家才是國學。而在21世紀的中國我認為要談中國的國學應該是「一首兩翼四足一尾的飛龍」：「一首」是頭，就是政治，以前是皇帝，現在是黨；「兩翼」則是中國的和外國的元素區分及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維模式；然後

是「四足」：一是普世的物質、享受、二是中國文化、三是佛教、四是基督教等洋教；而「尾巴」則是其他的諸多小元素。我覺得基督教應該是飛龍的一部分，因此，基督教也屬國學。

邢：關鍵是政府會否允許神學的討論歸回給教會。神學討論已經經歷了很長的時間，從民國開始到現在一直都有政治在裡面調節，要看將來政府是否願意將那隻手收回來。

黃：總結我們所討論到1920年代的非基運動，1950年代開始的「三自運動」，1998年以來的神學思想建設，以及2015年前後開始的基督教中國化運動這四個事件，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其一，這四個事件都與政教關係相關。其二，運動的主持者特別是「三自」領袖吳耀宗和神學思想建設的領袖丁光訓，既想處理政教關係，又想革新基要派的信仰內涵。但是，他們不僅遇到了教會內部

的挑戰，而且也沒有得到黨和政府的支持；因為黨和政府最關心的是讓教會順服政府，當吳耀宗無法用科學和理性來說服基要派信徒的時候，為了避免教會產生分歧，統戰部就對吳進行了約束，將精力都集中到參加「三自」之中去了；當丁主教淡化因信稱義引起信徒的擔憂時，黨和政府對神學思想建設的支持也就有所下降，只不過集中強調教會要與社會主義的社會相適應。其三，至於二十年代的非基運動和現在進行的中國化，表象都與民族主義相關，但實際關注的仍然是政教關係問題，但這兩次都充分地利用了民族主義來作為媒介。

六. 總結：政教關係問題對中國教會的挑戰，和拒絕權威的自由主義對歐美教會的挑戰

黃：最後，通過以上追溯和分析當代中國教會中發生的四個重大事件，可以說中國當代教會遇到的最重要挑戰之一就是如何處理政教關係問題。而基督教在全球所遇到的挑戰，則需要談到倫理道德敗壞及高舉自由主義所產生的問題。

其實，中國和歐美現在都面臨著倫理道德敗壞的挑戰，這不僅給教會提出了任務，也提出了挑戰。在過分注重物質發展的時候，人的精神和道德就面臨著敗壞的挑戰，如前些年中國在食物方面遇到了品質問題，比如蘇丹紅諸如此類的現象。

邢：嗯，對的。

黃：這樣，讓我做最後一點總結。



首先，當代中國教會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處理政教關係以及民族主義的問題。就自由主義與教會的關係而言，在中國、亞洲和許多仍然面臨集權和狹隘民族主義的地方，自由主義往往是教會的同盟，共同反對集權者，共同主張用理性、自由、平等、人權、博愛等理念來分析、解剖和批評狹隘的民族主義。³

其次，在歐美集權不再是主流的國家，自由主義則成了教會的最大挑戰者。如前所云，在中國和歐美現在都面臨著道德倫理敗壞的挑戰，但這些挑戰的表現方式卻不同。⁷

我的觀察是，中國人所遇到的嚴重挑戰是「言行不一」和「知行不一」的問題。雖然我們中國人都說要「知行合一」，但是，好像都存在「不合一」的問題。相對而言，在歐洲它確實「很合一」。歐美人覺得，我們的公共領域做好了，我的私人領域都不要管。所以，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而產生了中國和歐美在倫理道德敗壞上的表現差異呢？

在中國自秦始皇以來的秦漢之交，以前我們稱這個先秦時代奉行「神本主義」（theism），但是從秦漢朝以後，就變成「人本主義」（humanism）或「人文主義」了。這種改變以後，皇帝本來是天子，在人心靈精神的金字塔的寶座上，是最頂端。但是，皇帝不是最高的，他的頭上還有天，這是本來的意義。但後來由於人本主義的發展和神本主義的消退，最後，皇帝這位「天子」就代替了「天」。所以，在中國就出現了比較流行的說法，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產生「言行不一」。就是我有強權來欺壓你，就得服從。被壓迫者也就被迫做出一種

陽奉陰違的反應。於是就產生了偶像、假神。就是，「一個不是神的人」代替了「神」而成為「假神」。因為暴力和強權的緣故，其他人被迫作出表面服從而實際上不服從的陽奉陰違，言行不一和知行不一的行動。

比如，在中國等地，自由主義對教會挑戰的表現不是很明顯，但是，在歐美，教會遇到很大的挑戰就是來自於自由主義，也就是人的理性、自由觀念等。比方說，現在教會最火熱的就是同性戀的問題。常常在這些問題上，辯論者都是用人類的理性、愛等觀念迫使教會去做一些決定，但卻不一定是符合神的意願。歐洲教會面臨的主要挑戰和問題，就是不接受任何外在權威思想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理性主義（rationalism），也就是偶像的產生，在這些國家，人們的「理性」被當成了神和審判一切的標準。

概而言之，在集權的地方，一個人或一群人變成了上帝和不容任何人挑戰的絕對真理，社會和教會都必須服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僅「凱撒的要歸凱撒，上帝的也要歸凱撒」。這種通過暴力和強權實踐的制度，不僅要管理上帝所賦予的外在領域，而且要管轄歸上帝管理的人的內在和精神領域，因此，這就產生了言與行不一，知與行分離的陽奉陰違和信任危機。這是集權地區產生問題的根源。

在歐美地區，政府雖然不直接壓迫教會並給予社會充分的自由，但是，媒體和社會受到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民粹化主導，衝破了上帝作為權威的根基，以人的理性、感性和個人意志為標準，把民主、自由、人權等

概念都進行了新的闡釋，完全拋棄了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所關注的「信仰之內的理性」與「信仰之外的理性」之間的區分，使得每個人都變成了「上帝」，其思想、觀念和權利都必須得到無限制尊重。甚至連許多基督徒，也不再把《聖經》當作「上帝的話語」

（Word of God），而是當作「關於上帝的話語」（words about God），而且更加強調通過人的理性對《聖經》進行詮釋（interpretation/hermeneutics），消解了真理的絕對性和唯一性。因此，歐美國家雖然沒有哪個政府敢於聲稱自己是真理的化身或上帝的代言人來強迫教會與社會公民來服從，但是，每個自由的人都成了「真理」和「上帝」，借助於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區分，在道德倫理上，每個人的「眾意」（will of all / Volonté de tous），隨著人的理性、感性和意志而變化，消解了傳統上依賴於上帝而建立起來的「公意」（general will / volonté générale）。這種「人人都成為上帝而拒絕接受外在權威」的現象，如今成為了教會在歐美所遇到的最大挑戰，比如同性婚姻問題，現在成了歐美教會的最重大挑戰之一。

總括而言，在2017年的今天，我們有必要來思考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意義。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這三場運動中，今天社會和教會中遇到的挑戰，主要是只注重文藝復興所強調的「感性」與啟蒙運動所強調的「理性」，而沒有充分注重宗教改革所強調的「信仰」；結果，有的地方因為缺乏理性而仍然把一個人或一群人當成了代表上帝的真理，而在其他的地方則以理性為標準來追求感性的滿足，結果人人皆成為了有權

利而必須被尊重的「上帝」。沒有以絕對者為根基的「信仰」，人就會迷茫而喪失自我的「意志」，最終發瘋似地要成為超人般的「上帝」，完全拒絕外在的權威。

但願這些討論對我們有一些幫助。

邢：對，這個發言對我有很多的啟發。

（記錄：吳星輝、劉雲龍、李茹；校對：吳星輝、陳牧師；錄像：劉雲龍、杜柳柳；總協調：王睿；內容編輯：李方舟）

- 1 黃注：丁在1950年代就提出過類似主張。
- 2 趙天恩牧師等提出「三自」異象：中華民族福音化、中國教會國度化、中國文化基督化。很多不接受三自的海外牧者和大陸的家庭教會，都把這個三化和政府主導的基督教中國化，看為官方統戰和福音的對立的兩種思想。
- 3 中國教會其實也正在受到自由主義的挑戰，只是表現方式不同，因為中國教會在中國社會中還不是一個擁有很大言論影響力的團體，所以，社會還沒有逼著教會表態。但在傳福音方面（基督徒在婚姻戀愛和家庭方面的保守，在中國年輕人看來是落伍、封建、不開化的），特別是針對年輕人（甚至可以從70後算起），包括年輕信徒在人前實踐和表達信仰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中國的年輕一代，其實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不大，相反，娛樂文化、偶像文化（比如某個明星支持同性戀就可以對粉絲有一定的影響）、西方自由主義對他們影響很大，主要表現在「性」和「婚姻」的觀念上（一旦聽說基督徒是反對同性戀的，就對教會產生排斥）。中國的教會，在婚姻戀愛中，最常常教導的就是婚前守貞。